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九七期 ——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306a)

【史海钩沉】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要挨整的	萧 象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三)	孙怒涛
【读史笔记】	以史为鉴	周家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要挨整的

• 萧 象 •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你是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明确表示为“1965年1月”。而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纸报》中，毛泽东又有过“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的指称。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蓄谋倒刘，由来已久，时间上可以溯及到1962年。那么，在从毛泽东蓄谋倒刘到正式将其打倒这一长期过程中，作为被打倒对象的刘少奇，对此是否有所察觉？如果有，又是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要挨整了呢？

我们现已知道，毛刘恩怨其实亦由来已久，建国初始两人因思想分歧已出现矛盾，甚至在1953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就产生了某种不信任感，对刘进行过秘密调查。但尽管如此，客观而言，毛刘关系在五十年代整体上基本正常，两人之间的思想矛盾发展为激烈的政治斗争乃至面对面的直接冲突，是进入到1960年代，盖因于大跃进失败之后国内外诸多复杂矛盾与形势变化所致。而1962年的确是毛刘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至少有三件重大事情交集叠加使毛刘关系走向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中央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将大跃进失败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

原因认定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让毛泽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毛、刘政治势力对比出现微妙变化，两人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其次是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主张采取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调整，被毛泽东视为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后退与复归，毛泽东因此于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怒斥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则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作为回答。随后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右倾分田单干风（即包产到户）进行了全力反击与批判，重新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第三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下令对刘少奇再次进行秘密调查，试图证明刘少奇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国共南京秘密谈判期间，“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可以说，此事是决定毛刘关系走向的最为严重的一件事情，说明二者的矛盾冲突从此发生了重大的实质性变化，毛对刘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可以断定，毛最初萌发倒刘意图当就在此时。当然，由于调查处于秘密状态，刘少奇自是无从知晓。但两人发生的面对面的冲突是激烈的，毛泽东对单干风的反击是强烈的，所发出的批评是严厉的，于刘少奇不能不投下阴影。

阴影的再次出现是在两年后的1964年。这年上半年毛泽东同来访的外国党的领导人频繁谈起1962年国内的“右倾动摇”与反修防修问题，并在5——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其事地向党内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一严重问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为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亲笔添加了下面这段触目惊心的文字：“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162）

以历史的后视镜而观之，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问题，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主要针对的就是被视为自己接班人的刘少奇。诚然，毛的意图隐藏很深，其言说又给人一定的想象空间，人们当时除了引为一种政治的警惕，似不可能有何明确的联想。那么刘少奇呢？刘少奇不同。虽说刘少奇在是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也与毛一道论及修正主义问题，但仅止步于此，而毛不仅谈修正主义，更提赫鲁晓夫问题。修正主义是宽泛的抽象概念，赫鲁晓夫为独有的具象人物，具有特殊的含义，更能触动惟刘这样位置的人的神经。因此，作为接班人，刘少奇处于党内排名第二这一十分敏感的位置，与毛泽东既有历史积蓄的旧矛盾，更有当下发展的新冲突，对毛泽东赫鲁晓夫之说，他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而毫无感觉吗？

就在6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刘少奇即外出视察四清运动。“刘少奇历来严厉。但这次外出，不仅严厉，还显得很急躁，脾气很大。”（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页320）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江渭清，作为历史见证者，回忆说道：“当少奇同志到济南时，华东局曾派魏文伯同志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他到安徽。在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合肥后，魏文伯同志来电话向我和省委打招呼。……魏文伯同志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到了南京刘少奇再次“发了脾气。”（《江渭清回忆录》页483、488）

刘少奇此次外出是携夫人王光美一道同行，一路上王光美被地方党政频邀作桃园经验报告，于刘理应为一大快事，但却反现心情不佳，脾气很大。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刘少奇所以有如此表现，当与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不无关联，尤其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影射，有可能让刘少奇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但这种感觉属于朦朦胧胧，只可一己意会而无以言与他人，这就使得其心情烦躁，在接下来的外出视察途中，一反常态，脾气大发。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赫鲁晓夫的含沙射影让刘少奇在1964年夏天开始产生一种朦胧的感

觉，那么，到了这年的冬天毛刘再次发生的尖锐冲突以及毛此间诸多针对刘的激烈言行，无疑把刘的这种感觉变为了一种明显的意识，让其意识到一团政治危机的乌云正向他袭来。

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1964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社教重点指向严重分歧而发生的尖锐冲突，史书多有记载，此处不再赘述，仅引述我们以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两则史料，来说明这一冲突带给刘怎样的危机以及危机的严重程度。

请看陈伯达的回忆：“毛主席在那次会上拿出党章以申明他在会有发言权之后，一天晚上，他连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个文件。他口说，我匆匆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做了几次修改，经中央讨论修改后通过。这个文件就是‘二十三条’。毛主席找我谈时，表示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见，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团结很重要，要想个办法避免事情发生。我与列席会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铸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谈，请他向毛主席做个检讨，缓和一下关系。”（《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页253）

毛对刘表示了“很大意见”，这是陈伯达的委婉说法，王力的表达更为直接而明确：“1964年12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诉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王力反思录》页173—174）

“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第一次向其政治秘书流露出了倒刘意图，而且，据刘少奇之子刘源披露，毛泽东此间甚至直接冲着刘少奇说出过这样的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页118）

一边是陈伯达与彭真、陶铸等危情提醒与调和劝说，一边是毛泽东的直白威胁，刘少奇对来自毛泽东巨大的政治压力以及压力所形成的政治危机不会不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与清醒的意识。杨尚昆的一则日记从第三者观察的角度可以进一步证明刘少奇政治危机存在的严重程度。《杨尚昆日记》笔下一向非常谨慎，绝少涉及党内的具体人事，但在1965年1月14日却用罕见的笔调写道：“现在要注意：刘话不灵了”。

此后一年，随着毛泽东倒刘图谋逐渐酝酿成熟和文革战略部署逐步实施，谪居京城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被遣往西南，中办主任杨尚昆被降职调离京城，《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新一轮文化批判大潮，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上海会议上被突然打倒，党和国家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刘少奇的自我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强烈。

1966年元月的一天，刘少奇将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一起，颇为感慨地对大家说道：“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黄铮：《王光美访问录》 页106）

在革命永不言退和领导干部终身制的红色年代，67岁的刘少奇竟突然想到来日不多，想到退休去改做教师，这实在与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大不相称。但这恰好是个信号，说明刘少奇预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危机与不安。但又不便于明说，惟藉以谈话的方式向家人发出暗示，暗示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很可能自己的地位难保，命运难卜。（党内高层预感自己地位不保而事先向家人发出暗示的，刘少奇不是孤例，1970年陈伯达倒台

前数月，曾为其子书写唐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暗示自己可能下台，家要发生变故。）

不出数月，文革爆发。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乃是打倒刘少奇、进而清算以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中央5月份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为发动标志。《通知》中下列这段被视为“画龙点睛”也是最为要害的一段文字，为毛泽东亲笔添写：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此时，党内排名仅次于七常委的政治局委员彭真和同为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以及杨尚昆已相继倒台，与罗瑞卿捆绑一起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刘少奇以其几十年党内复杂而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经历与经验，不会不感到此次运动来势凶猛，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而62年尤其是64年以来与毛的矛盾斗争与尖锐冲突，更会令其感到毛泽东此回绝对来者不善，所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其用心何在，其所指何人，政治危机已变为迫在眉睫的危险。

5月18日，也就是《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在会上做了著名的被称为“政变经”的讲话。李雪峰在《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中这样说道：林彪“大讲‘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少奇危如累卵，夫复何言！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断定：至迟不晚于1966年5月中旬，也就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之时，刘少奇已明显察觉到了毛泽东的不良图谋，感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别有居心，这就是说，文革一始，刘少奇就感到自己要挨整了。

把刘少奇明确感到自己要挨整的时间认定为1966年5月中旬，一个接踵而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出回答，那就是，刘少奇既然文革伊始就意识到了毛泽东的企图，感到自己要挨整了，为什么不见他对这一运动有任何的不满与抵触，难道他不清楚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雨会打湿全身？不清楚党内斗争中挨整者下场的前车之鉴？

刘少奇当然清楚一场暴雨会打湿全身，清楚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但，由于这场运动本身反修防修这一宏大叙事的“政治正确”，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内共识，是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内心认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都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而毛泽东包裹在宏大叙事下的权力图谋，则由于长期以来以刘少奇自己为首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让毛成了党的化身，位尊全党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权威，任何对毛的抵触就意味着对党的抵触，是引发全党共愤的反党行为，这就使得刘不仅无力也不敢进行抵触。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规定性下，刘少奇尽管心知肚明毛泽东别有企图，意识到自己大难临头，但却如哑人食黄连有苦难言，他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别无办法，只能心怀侥幸，逆来顺受，企望在一场无法避让的危及自身政治生命的运动中能涉险过关，化险为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运动中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表现积极，有所作为，以此来证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性和对毛的紧跟服从。

所以，刘少奇不仅对毛泽东发动指向自身的文革运动没有抵触，反而躬身迎合，投入其中，亦步亦趋，充当推手。在其受权领导文革运动初期的数月间，一方面对彭真、罗瑞卿等已倒台

的亲信属僚，明知并非反党，亦无大过，为顺从毛意，自保过关，不惜上纲上线，进行严厉批判——与其划线切割；另一方面采用极左的运动方式，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打成黑帮，把大批大专学校师生生活跃分子作为右派进行揪斗——推动运动发展。但，即便如此，还是难免掉进毛早已设计的“请君入瓮”的陷阱，未能摆脱被揪出打倒、最终殒命开封的厄运。

由此，更能见出刘少奇文革命运巨大而深刻的悲剧性。

2 0 1 3 - 5 - 9

□ 原载《共识网》

~~~~~

### 【劫后反思】

####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三）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5 c）

## 第五章 “井冈山”一统清华错误不断（1966．10—1967．4）

### 第一节 应邀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筹备会，不为所动

那是9月21日，我在新斋前面东西走向的那条马路上看路南的大字报。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忽听身旁有一个人问我：“你是孙怒涛吗？”

我扭头一看，是个我不认识的同学。也是瘦高的个子，也是戴着一副眼镜，长得眉清目秀的。

我疑惑地看着他，回答说：“是的呀！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他微微一笑，说：“看过你写的《少数赞》，我当然知道的啦！”

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鲍长康。我一听这名字，顿生钦佩之意。原来他就是那个除了蒯大富以外，与刘才堂、刘泉等齐名的大蒯派啊。

当时以蒯大富为首的工化系902班有好几个学生一起反工作组。在工作组全校批判蒯大富的时候，鲍长康、刘才堂也是时时被提及的蒯式人物。那时，我对鲍长康只闻其名，不识其人。

我转过身来，与他面对面的站着，对视着。我的脸上肯定写满了惊奇。惊奇我面对的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鲍长康，更惊奇他怎么会认得我？

当时清华有一万多名学生，住在1—13号楼及新斋等学生宿舍。1—4号楼及新斋等在西区，靠近学校中心区，5—12号楼在东区，13号楼孤零零地戳在这两区中间的北部。一般一个系的学生都住在同一幢楼。在同一个楼住又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的同学彼此常打照面，还能面熟。

我住东区12号楼，鲍长康住在新斋。这次在西区的大字报区碰到，肯定是偶遇。但他能估摸出我是谁，真的让我很惊奇。

鲍长康确认了我以后，对我说，晚上在二宿舍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我说，好的呀！有人邀请我参加会议，听听看看，多点消息，长点见识，又有何妨？

我回到宿舍，老许等告诉我，说张云辉来过了，留了一张条子，是通知我晚上参加会议的。我想，看来蒯大富他们已经把我给惦记上了。即使没有我与鲍长康的偶遇，留条还在宿舍里等着我呢。

开会的地点是在学校西北角的二宿舍，比较僻静，离工化系学生的宿舍楼不远。

与会的有20多人。要说认识，只有在全校大会上被批判过的蒯大富和刚刚认识的鲍长康二人，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经介绍，有彭伟民、张云辉、刘刚38等人。他们之间互相认识的很多，估计不少是工化系的蒯派们。

蒯大富是会议的主持人。毫无疑问，他也是这个会上最活跃的人物。

蒯大富的口才，我已经在他与工作组的全校辩论会上领教过了。他思维敏捷，条理清楚，不打草稿，可以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宏论。相比较那些磕磕巴巴念着发言稿为工作组辩护的对手们，着实要更胜一筹。

蒯大富首先传达了张春桥与他的谈话内容。为了强调重要性和可信性，他看着笔记本上的记录念了两遍。

蒯大富告诉与会者，中央文革是支持我们的。他接着分析清华的形势，指出“清华大学红卫兵”是老保组织，已经溃不成军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右倾的，斗争性不强，在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上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也不为被工作组错误批判压制的蒯派真正平反，他对此已经失去了信心。蒯大富情绪激动，握着拳头说：“所以，我们必须成立一个真正能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彻底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与“清华大学红卫兵”斗争到底！”

接着，大家发言、表态。在蒯大富的鼓动下，多数发言者显得很兴奋，很激情，纷纷对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的设想表示支持，愿意参加。以蒯大富为首的几个核心人物，显然已经在事先有过密谋。他们的初步设想，经过大家七嘴八舌的补充完善，新的红卫兵就要由策划变为实施了。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井冈山红卫兵”的筹备会。

与绝大多数与会者热烈表态、踊跃参加不同，我一直静静地坐着，默默地听着，心里在思考着、盘算着。我知道，这是一件大事。

对于蒯大富，除了他的口才，我更佩服他在政治高压下坚持不屈、以绝食抗争的胆量和勇气。

薄一波这个倚老卖老的副总理在大字报区偶遇蒯大富，就老实不客气地给他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说他“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工作组更是不知道给他戴上了多少顶反革命的帽子。这样罕见的政治压力，在清华几乎没一个人能顶得住。如我，刚有一点压力就早早地做检查，趴下了。

我自知没有多大的政治勇气，因而就格外佩服那些无畏无惧敢于抗争的英雄们。过去敬佩的是那些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士，在当时我佩服的就是蒯大富。

但是我很难认可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有必要反工作组。那点起因、那点理由，并不能得出“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结论。所以，要我承认他一开始就有很高的路线觉悟，我做不到。倒是工作组在全校一反蒯，真的让起初大方向并不怎么错的工作组开始犯错误，让蒯大富“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预言”竟一语成谶。

至于所谓张春桥的接见谈话、中央文革支持之类的消息，我半信半疑，对此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总觉得，自己要不要参加这个即将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应建立在对大局形势的判断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位中央首长的态度上。

我在申请参加“自控系红卫兵”的时候是那样的冒冒失失，而在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时候显得谨小慎微。是因为从反面吸取了教训，还是因为政治上成熟点了？

我对蒯大富的形势分析是完全赞同的，也认为成立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是必要的。所以，我内心是倾向于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但是有两点让我犹豫的因素：

一个是，我当时已经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尽管我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现状很不满意，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帮助它，不应该另起炉灶。何况我已经是“思想兵”，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改换门庭，从这个红卫兵组织跑到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去呢？

与会的这些蒯派们，他们大多被工作组在全校或全系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批判过，都是很出名的蒯派。这群香味没有余臭尚存的蒯派们，即便他们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不是很乐意地欢迎他们还很难说。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失望情绪越大，要抱成团建立一个自己红卫兵的心情也越是迫切。这点上，我与他们在程度上是有差别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在我来参加会议之前，“怒涛”战斗组的组员们已经对老蒯叫我去开一个什么样的会议有了估计。老许、老林态度严肃地告诫我：你要去参加会议听一听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蒯大富要拉你参加一个什么组织，那是坚决不能同意的。为了战斗组的团结，我在来前答应过他们一定不会擅自参加新的组织。

所以，当大家都表态会议几近结束的时候，蒯大富见我一直没说话，就问我：“老孙，你怎么样？”我说：“学校里的政治气氛确实很沉闷，我也感觉憋得慌。但是，虽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斗争不坚决，我们还是应该尽力帮助它，另搞一个红卫兵，可能不是太合适吧？所以我要再想一想。”蒯大富听了我的发言，感到非常失望。他知道我没有参加的意思，就叫我好好的再考虑考虑。

虽然没有表态参加，但我心里还是很牵挂着这件事。于是，在第二天晚上我又跑到二宿舍。蒯大富他们正忙得要命，几个人在起草“井冈山红卫兵”的宣言、通告、组织原则等文件。我有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看到蒯大富正在起草一份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条件，上面写着，第一条是要有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第二条是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觉得第二条比第一条更重要，就对蒯大富说：第一条与第二条是不是应该对调一下比较好？蒯大富说，现在就是要特别强调“彻底的革命造反精神”。我觉得与他有点话不投机的感觉，于是就知趣地悄悄离开了。

9月23日，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正式宣告成立。

“井冈山红卫兵”的出现，在校内并没有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因为在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了好几个新的红卫兵组织，如“遵义红卫兵”、“延安红卫兵”等等。但是，“井冈山红卫兵”毕竟这是由全校闻名、颇受争议的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所以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

像我这样参加了筹备会议而没有当即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人也有，但是不多，大多数人比我有更强的敏感性和决断力。

## 第二节 大局明朗，赶紧上了“井冈山”

国庆前后的那些天，清华园里虽有纷争，但总体平静。算得上新闻的，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生了分裂，有了两个总部：“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我那时正被指派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方队，为练习正步走而集训。

10月2号，《红旗》杂志13期发表了一篇极其重要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社论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

看了这篇社论，我立即意识到校内前一阶段关于当前运动的主要任务究竟是斗黑帮还是深入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争论，中央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指示，那就是应该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清华主要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本来就站在工作组这一边，与工作组沆瀣一气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其思想右倾，软弱无力，内部分裂，无法再深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新近成立的“井冈山红卫兵”，高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才是我校新兴的最坚定的革命力量。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前几天没有大胆果敢地参加“井冈山红卫兵”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一旦明白了下一阶段运动的大方向，我也知道了我该怎么做。既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已经明显落伍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死守着它不放，不去投奔“井冈山红卫兵”呢？为什么一定要被“怒涛”战斗组其他同学所牵制，不敢孤身前行、勇往直前呢？

我当即写了一篇表态的大字报，贴在土建系前面的大字报区。题目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逼上井冈山，跟党闹革命》。那一天，是10月3日，我“上山”的日子。

这个“逼”字，在我写大字报的时候也感觉到有点言过其实。起码，当时并没有人把我逼得如林冲逼上梁山那样的地步吧。所谓“逼”，真实的意思是我有一种被形势所“逼”的紧迫感，要再不“上山”就要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了！

十天前，鲍长康客气地请我“上山”，蒯大富热情地邀我“落草”，我没有答应。那个时候我只要点一下头，就是最早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二十来个元老之一了。现在是我自己主动来投靠“山寨”的，有那么一点点“敬酒不吃”的尴尬。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因为面子上下不来而不敢“上山”。因为，重要的是，我是在听到了中央的声音看清了大形势而不是仅仅因为上面有某某支持才下决心的。不过，从这件事上，我也看透了自己不是那种造反精神很强、思想前瞻、敢于冒险、胆子很大的人。我的路线觉悟显然比那些早于我加入“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们要低得多，所以我很佩服他们。



10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作了重要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更让我惊奇和惊喜的是，就在这个大会上，蒯大富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的红卫兵宣读“誓词”。

这个场面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中央果真是支持蒯大富的。蒯大富那天晚上说他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话确非虚言。而我在前几天果断地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决定也是正确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井冈山红卫兵”时来运转，今非昔比。它的门前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蒯大富也从此真正走出清华，名扬全国。

### 第三节 受蒯大富重托，组建“第一湘江”

我来到当时“井冈山红卫兵”所在地的丙所。蒯大富听了我的来意，很大气，对我这个看清形势才“入伙”的人，依然表示了热情的欢迎。那个时候，“井冈山红卫兵”正利用有利时机加紧招兵买马，趁势扩充队伍。蒯大富对我说：“老孙，看过你写的《少数赞》，你文章写得不错，我这里已经有两个直属战斗组了，你来筹建第三个战斗组吧！”

我当时的感觉是，他希望这第三战斗组也能成为他的很有战斗力的又一嫡系战斗组。我答应了。于是他把最近投奔到“井冈山红卫兵”并已被批准加入的一摞申请表给了我，让我自己挑选。我按照不保校党委、不保工作组等标准从中选择了几个人。

就这样我筹建了“第一湘江”。湘江，哺育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诞生过极有影响力的进步刊物《湘江评论》。这是一个我心仪向往的神圣之地。那个时候，取战斗组的名字，好多都是与红色经典有点关联的。

“第一湘江”的第一个成员就是王允方（工化00）。他是老蒯特地向我推荐的，我当然格外看重。他是上海人，长得很清秀。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能感觉那种上海人的聪明和机灵。他是化001班的，与蒯大富同系。9月28日，他由他的同班同学、“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的彭伟民介绍参加的，“上山”的资历比我还要老好几天。他也是被工作组狠整过的蒯派。

我与他刚开始相识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随着彼此交往的加深，我发觉我们俩很合得来。他善于思考，有独立见解，观点也不偏激，与我非常一致。他人品极好，为人真诚、热情、谦和、宽容，极有正义感，富有同情心。他才思敏捷，文章写得很好，出手也快，是“第一湘江”的主力笔杆子。一手秀气飘逸的好字，也让我很欣赏。他有非常出色的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所交朋友很广泛，有良好的人缘，这些正是我所欠缺的。他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更乐意在底下做一个出谋划策、协商沟通、穿针引线的人。这点与我正好互补。那几年中，他是最信得过的“高参”，我的好多思想都是由他那里得到启发，甚至就是直接从他那里“贩卖”过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了解、磨合以后，经过几次政治风浪的考验以后，我们成了挚友。几十年来，我与他的友谊始终如一，延续至今。从我走出班级以后，我有幸在清华大舞台上结识了不少有思想、有见地、有才气、敢担当的优秀人物，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良材，王允方就是我所结识的这批朋友中的第一人！

“第一湘江”的其他成员，还有刘惠明、殷江昊（殷长实）、刘国先、沈文龙、万挺（万陵馨）、戎兵、常峰、小宋，总数正好是十个同学。王允方说他“上山”的时候“井冈山红卫兵”才五十来人，到我组建“第一湘江”的时候，可能才百把人。蒯大富为了筹建第三战斗组，一下子就同意让我挑走了这么多人，足见他的魄力以及他对我的器重。

“第一湘江”的第一次全组会议各自先做自我介绍。原来大多数都是大大小小的蒯派，挨整受压的。大家来自不同的系不同的专业，自控系的有好几位。既有像我这样大六的高年级学生，也有大一的小学弟。如刘惠明（自6）是与我同系同年级的高年级同学，他为人诚恳，处事稳重，考虑周全，特别能够团结人。殷江昊（自0）是低班同学，他性格和善，勤于考虑，思想敏锐，文笔快好。他们都是组里最有力的骨干。这样一个跨系跨年级的战斗组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有利于信息的交流、思想的活跃、视野的开阔、见解的互补。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进行，有个别组员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又陆续补充吸收了一些新的组员。程树楷、李忠智、贾维平、唐松立、陈柏年、王芳、邵群涛、小吴等都曾经是“第一湘江”的组员。

我在这里列出了“第一湘江”的组员名单（可能还有个别遗忘的），是因为我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有过难忘的经历。我一直以来都是很想念他们的，尽管后来因各种原因，特别是在4 1 4闹分裂的时候，有一部分组员离我而去。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唐松立（汽02）同学。他因为在组内发表“可以给毛主席贴大字报”这类当时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反动”言论而引起全体组员的公愤，大家一致举手通过把他开除出组。现在想来，这样粗暴无情地对待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同学，我作为组长，尤其感到深深的愧疚。相比较这些先知先觉的同学，我那时的思想还完全停留在“贴毛主席的大字报、反对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统统都是反革命”这样的认识层次上。

蒯大富叫我筹建第三战斗组的时候，还特意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清华大学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的假红卫兵”。我同意这个观点。于是，“第一湘江”出的第一篇大字报，就是这篇文章。贴出去以后，反响很大。于是，又连续写了二评、三评。至于其他还写了点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蒯大富说的第一第二直属战斗组叫什么名字，谁是组长，我一直不知道。或者，他告诉过我，我没往心里记。很多年后，我听闻第一战斗组叫“红辣椒”，只有一个人。第二战斗组可能是个空号（或者没怎么活动过）。只有我这个第三战斗组还比较人丁兴旺，在学校里小有名气。我与那两个战斗组没有什么往来，也没搞过联合行动。这是有点奇怪的。除了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这一想法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革命大串联的冲击波引得我们都是眼睛向外，人心浮动了。

#### 第四节 南下串联，病困南宁

八九月份的时候，串联之风开始刮起来了。到了十月份，学校里已经显得有点冷清。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成了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清华园里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风头渐长的“井冈山红卫兵”、日渐消退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是已经作鸟兽散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都纷纷外出去串联了。

延安、井冈山、遵义这些革命圣地，自然是狂热的红卫兵最想去顶礼膜拜的首选地。许多红卫兵都是徒步而去，走红军曾经走过的路，经风雨、见世面，既是学习，也是锻炼，更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播撒到神州大地、穷乡僻壤。

还有不少去全国各大城市的。那时去广州的人非常多，听说刘涛也去广州了。我与大家商量了一下，10月中旬，我们也随大流去了广州，后来又去了南宁。

我们一行十个人乘火车南行。当火车行驶经过长沙的时候，我们遥望湘江指指点点，心潮澎湃，因为我们是“第一湘江”战斗组。

那时，串联的学生南来北往，火车上的人挤得一塌糊涂。能四五个人挤着坐一张座椅已经是最好的享受的了。钻到座位底下躺一会儿更是“卧铺”的待遇。过道里、座椅前、厕所里，到处都挤着人。许多人只能站一条腿，另一条腿无插足之地，就这样始终保持金鸡独立状。车厢就像一个巨大的沙丁鱼罐头。

列车上，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隔壁是一列空闲着的卧铺车厢，过道门锁着，进不去。有人把门弄开了，于是大家蜂拥而进。我们战斗组的几名疲惫不堪的女同学也转移过去了。她们叫我也过去。尽管我已经略感风寒，精神不爽，我知道我是不能过去的。要是一过去，万一出点事话就说不响了。

不一会儿，在卧铺车厢里有人在大声吼道：“谁把车厢门撬开的呀？这是违反铁路规定的！是谁想造反呀？”

没人吭声，吼叫声还在继续。

我挤过去一看，见是一个乘警神色恼怒地在咆哮。我说，门是我打开的。

他见我出头，气愤得说话都打结了，冲着我说：“你……你……你这是在搞破坏！”说着说着，他把手伸向腰间，要掏匣子枪。

我一见他想要动武，就吓唬他：“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进行革命大串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敢把枪对着毛主席坚决支持的红卫兵吗？现在那么多的红卫兵挤在车上，有的已经生病了，你却空着卧铺车厢，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啊？”

我拉着虎皮当大旗对他扣着大帽子一阵咋呼，还把歪理讲得理直气壮。我们战斗组的人也一起为我帮腔：“你看，我们队长（他们把我从组长升级到队长了！）自己还挤在那边的车厢里，只让这些有病的身體弱的红卫兵来这里休息一会儿，你可不能站在红卫兵的对立面，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去呀！”其他学生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起哄。

这位乘警气得说不出话来。看到我们人多势众，他孤掌难鸣，不敢真的动手犯了众怒，只得悻悻地走了。走前撂下一句话：“千万别把卧具弄脏了！”

他的身后是我们的一片掌声。这既是我们的自我庆祝，也是对这位乘警敬业精神的敬意。真要是讲道理的话我们是讲不过他的，于是只好用“革命的名义”把他气跑了。好在这也不是一件原则性的大事。

我们到南宁下了车。在西南民族学院落脚。

那时，红卫兵是“天兵天将”，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也不要钱。谁见了都敬畏三分。

虽说大串联的目的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但是我们这个战斗组在广州，在南宁，说话行事都比较谨慎。我们只是到各个学校或机关看看大字报，了解当地文革的形势。我们完全不是那些老子天下第一不顺眼就轮起铜头皮带打人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我们毕竟是大学生，比他们更多知道一点“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

于是，多看、少说、不轻易表态，不深度插足当地的运动，成了我们每到一地的言行准则。就这样，我们在南宁的一些院校和机关里串联了几天。

就在此时，我得病了，大家把我送进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一检查，没想到还挺严重的，得住院治疗。

本来我们打算离开南宁后，再到别的地方转转的。我不能同行，怎么办？总不能让那么多人都陪着我住院吧？

与王允方等商量，决定大家先返回北京。因为已经出来了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学校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了，大家心里都很记挂。

他们商议后要留一两个同学陪我住院，我坚决不同意。我这毛病，能吃能睡能走动的，只是有点发烧和胸痛，用不着陪护的。于是，全组人马返回北京。

经诊断，我开始得的是肺炎，后来转成胸膜炎，胸腔里已经有大量的积液。

我体质向来较弱。1米8的个子，只有一百十几斤重。瘦长体型，像豆芽菜。再加上文革以来，思想紧张，压力剧增，作息无规律，常通宵达旦地折腾，就这样积劳成疾，累垮了。

几次穿刺抽液，抽出了许多带血的积液。打链霉素针，吃雷米封药，经过治疗，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

我给王允方写了一封信，开玩笑地说，每天要在屁股上钻Φ0.8的小孔若干，现在都已经没地方下钻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疗条件很不错。虽然在文革中，这所医院的医疗秩序当时还是比较正常的。他们对我进行积极认真的救治。

有个小护士，对我这个清华大学来的红卫兵，格外的崇敬和照顾，护理十分细心，连我的内衣内裤也一定要帮我洗，令我深为感动！

感觉自己已经不发烧了，不胸痛了，胸腔内也没积液了，我要求出院。主治医生说，才半个月，刚控制住病情，要马上出院，那不行的。

我心里实在惦记着学校的运动。离开了“第一湘江”，我心里空落落的。

医生无奈，对我说：你这个胸膜炎是结核性的，体质下降的时候结核菌就要活动。结核菌跑到哪，哪里就得结核病！跑到肺里得肺结核，跑到脑里得脑结核，跑到骨头里得骨结核。你出院以后起码要好好静养半年！

医生的话吓得我一愣一愣的。我将信将疑，点头连说是、是，但是我还是要求马上出院。医生不好强行劝阻，把话送到了也就尽到责任了。很可能对我这样从北京来的红卫兵，他也不敢多说什么吧？

住院17天，一出院就上了火车。革命大串联时期，想到啥地方就可以到啥地方，很方便。

那已是11月下旬。北上的时候，真想拐道到上海看看爸爸后再回北京。我已经有二三年没见到爸爸妈妈了。妈妈在老家乡下，要从杭州再转火车、汽车、走路，很不便的，所以没敢想。爸爸在上海，较为顺路的。

从株洲折东经上海回北京与从南宁直接回北京，路远不了多少，时间也耽误不了几天的。但是这个念头刚一閃，就觉得心里不安，脸上发烧。别人都在全身心地搞文化大革命中，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殊死的战斗，我怎么可以为个人私事而忘却我的责任呢？这“私心一闪念”让我羞愧不已，决定直接回北京。

回到学校，见到王允方他们。大家见我病愈了，都很高兴。至于医生在我出院时的医嘱，早被我抛到脑后去了。在这革命的年代里，在这激荡的校园里，我没法静心休养。我想，拼了命也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斗到底！

## 第五节 为促三总部联合，成立“天安门纵队”

到了11月份下旬，外出串联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回校了。学校里又热闹了起来。

这段时间我与蒯大富走得很近，彼此经常讨论一些问题。

有一天在甲所，因为太晚了，老蒯留我，他房间里正好有个空铺，我也懒得回宿舍去，于是就在老蒯住的房间里睡了一夜，聊了不少天。

11月份的清华，“清华大学红卫兵”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支独秀的“井冈山红卫兵”以外，还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及“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遵义红卫兵”这些林林总总的红卫兵组织。

报刊社论在宣传，中央首长讲话，都要求各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下面的群众，隶属于不同红卫兵组织的战斗组，纷纷贴出大字报敦促头头们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的号召，呼吁尽快实现大联合。

我和“第一湘江”的组员们都觉得，红卫兵组织山头林立的局面应当尽快结束。我们也与其他战斗组一样大声疾呼，要求联合。

但是，无论是人多势众的红卫兵，还是只有“七八个人十来条枪”的红卫兵，虽然嘴上都表示愿意联合，但是各打各的算盘，各怀各的心思，对于联合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各个红卫兵之间政治观点上有分歧，难以求同存异，这当然是主要的障碍。心存疑虑也是原因之一。可能有想趁机吃掉别人的或怕被别人吃掉的，可能有宁做鸡头保持独立自由、不做凤尾任人摆布的。总之，在联合问题上，我们在下面看到的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很缓慢。

从11月底开始的三总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和“毛

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开门整风,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联合做思想上的准备。“11月30日 成立由小组长联席会议产生的三总部整风领导小组,有“第一湘江”、“第一红岩”、“老实话”、“锬未残”、“1018”等小组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因为这个机缘,我在整风领导小组里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

群众积极要求联合,头头顾虑重重。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对我所在的“井冈山红卫兵”进行炮轰,敦促蒯大富顾全大局,下决心赶快联合。

王允方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把学校里有影响力的分属于不同红卫兵的战斗组先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促进联合,说不定会极大加快联合的进程。

我觉得这个提议很有道理,而且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于是,我们就先找我们的邻居“轮机兵”谈去。

“第一湘江”刚成立的时候在学校西区找了一个地方,大串连回来后搬到了新水利馆。新水在大礼堂的东侧,地处学校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那时,学校的各个教室,只要你愿意,只要是别人还没有占据的,你都可以占为己用。古人叫占山为王,我们是占教室为王。或志同道合,或游说拉拢,不管通过什么办法,能拉多少人“入伙”,就能竖起一面多大的旗,围起一座多大的“山寨”。

我是“第一湘江”的“山大王”,汲鹏是“轮机兵”的“山大王”。

“轮机兵”早就占了新水403。我们刚开始时在新水找不到地盘,就找他们商量,合用一间教室,暂时栖身。

不久,我们找到新水311落脚,“轮机兵”搬到新水308,我们依旧是相距很近的邻居。

“第一湘江”是跨系的属于“井冈山红卫兵”的战斗组,“轮机兵”是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战斗组,基本上都是汲鹏所在冶金系的同学。我们在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彼此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当一致,观点都比较温和,彼此相处十分愉快,所以我们之间经常互相串门。我与陆小宝、周家琮、冯海、张蔼玲、雷翎、冯韵芬、卢清萍、顾家琳等“轮机兵”骨干,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

当我们把以下促上实现大联合的设想与他们一说,他们觉得确有道理,很感兴趣。只是感到就我们这两个战斗组,力量太小了一些,影响力也不大。于是决定由王允方、陆小宝等再去串联别的战斗组。

据王允方说,他一个人就串联了十几个战斗组。他说他自报家门是“第一湘江”的孙怒涛让来联系的,于是受到这些战斗组的友好接待。对于我们的建议,多数表示赞同,也有一些表示不感兴趣。听了串联了一圈回来的王允方的汇报,大家都很受鼓舞。

12月15日,在“第一湘江”所在地,由我召集并主持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井冈山”、“八八(总部)”、“临时总部”所属部分战斗组成立“天安门战斗兵团”40。”这里所说的“部分战斗组”就是“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锬未残”、“巴黎公社”、“红色风暴”、“红鹰”、“第一燎原”、“人民万岁”、“第一红五星”、“第一送瘟神”、“无名”、“沧海横流”等。

在有十几个战斗组近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我明确提出我们这些战斗组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大的战斗团体的目的就是要以下面战斗组联合的实际行动来促进上面几个红卫兵组织的联合。大家在发言中纷纷表态：头头们不联合，我们下面先联合！

关于新团体的名称，大家提了好几个名字。议论比较了一番，各有长短，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我提议用“天安门”这个名称。一来，天安门也是如井冈山、遵义、延安等名称一样，都是红色革命的象征。二来，我坦率地对大家说，我希望我们这个新组织的基本观点不要像某些人的观点那么左，也不要像另一些人的观点那么右。我不喜欢走极端的思想倾向。我说：“我们不要做‘东单’，也不要做‘西单’，我们要做中间的‘天安门’！”

最终大家都同意“天安门战斗兵团”这个称谓。由“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起草的“天安门战斗兵团”成立宣言也顺利通过。

关于“天安门战斗兵团”的组织机构，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实行战斗组组长联席会议这种形式。除了联席会议的决议必须执行以外，各战斗组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所以，这个“天安门战斗兵团”实际上是由十几个战斗组组成的一个联合体。而且有意思的是，大会没有推选或指定“天安门战斗兵团”的负责人或者召集人。任何一个战斗组组长都有权召集联席会议，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民主管理的好形式。

会议还决定，回去各个战斗组以促联合为主题出一批大字报。于是，第二天，以“天安门战斗兵团××战斗组”署名的一大批大字报占据了大礼堂中心区的显眼位置。这众多的大字报在分量和气势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这样的声势和影响是单打独斗的某个战斗组无法达到的。

很荣幸的是，我因此结识了高季章（水9）、王良生（水9）、段云富（工化6）、彭正光、黄瑞和（工化研）、吴国是、孙扬名、杨成勋、颜慧中、胡鹏池、郁强、李贵芝、李伯川、邹得和、郭创贤、林蓓蕾、董建尧、任敦渭、刘延荣、杨秋生等一大批好友。

蒯大富听说是我发起成立了“天安门战斗兵团”，很不满意。崔兆喜（电9）受他之命专门为此事跑到新水来找我。

那天我正好不在，是王允方接待的。后来王允方告诉我，崔兆喜问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把“第一湘江”从“井冈山红卫兵”中拉出去？他说老蒯担心不仅原有的几个红卫兵还没有联合起来，现在又多出来一个“天安门战斗兵团”这个山头，更难办了。他说着说着，难过得都要掉眼泪了。王允方一再向崔兆喜解释事情的原委，一再表示“第一湘江”不会脱离“井冈山红卫兵”。一旦大联合促成，“天安门战斗兵团”将服从联合总部的领导。崔兆喜听了，将信将疑。

在中央的号召41以及群众的敦促之下，1966年12月1日上午，由蒯大富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唐伟、陈育延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刘泉代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随即，“延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兵团”、“忠于党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红旗红卫兵在校临时总部”等人少力小的红卫兵纷纷宣布解散或整体加入“井冈山兵团”。

那一天，清华大学两个红卫兵三个总部终于在组织上联合起来了，“井冈山兵团”一统清华天下。

对于最终有了联合的大好局面，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推动联合的众力中，我们尽了自己的一点心，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当我看到联合后成立的新组织名称叫“井冈山兵团”时，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前几天成立的“天安门战斗兵团”的名称十分不妥。尽管我们成立在先，此刻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名称给人造成是在与“井冈山兵团”平起平坐的错觉。第二天，我召集“天安门战斗兵团”的联席会议，提议更名为“天安门纵队”。“纵队”的级别一看就知道低于“兵团”。我们以此告诉大家，我们只不过是“井冈山兵团”下属的一个“纵队”而已。就这样，“天安门纵队”成为“井冈山兵团”下的第一个纵队。

我们为大联合后的“井冈山兵团”搞了一个实际的大动作，它记录在清华文革的大事记中：“以“天安门纵队”为主，并有“打落水狗”等13个战斗小组百余人进城去张贴标语及大字报。”

## 第六节 “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把我拉进总部

12月21日，经三个总部提名协商，“井冈山兵团”筹委会由“蒯大富、陈育延、唐伟、刘泉、鲍长康、宁奎喜、夏纪辰、韩福强、刘才堂、朱德明、李宝余、王良生、许胜利（许征强）、张云辉、孙怒涛、郭西安、崔兆喜、魏成源、邵凯胜、潘剑宏共20人42”组成。

联合后的新组织“井冈山兵团”沿用了“井冈山”这一名称。蒯大富当上了一把手。筹委会中，由“井冈山红卫兵”推荐的委员有一半之多。“井冈山红卫兵”是这次联合的最大赢家。这是因为它是清华第一大红卫兵组织，更因为它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支持。

“井冈山红卫兵”提名的委员，基本上都是与蒯大富有过共同患难经历、并且较早就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其中几位是蒯大富的同班或同年级的同学。

我被蒯大富提名为总部委员，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他事先没有给我透过口风，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我事后猜测过。我想，随着“井冈山红卫兵”的发展壮大，尤其是联合以后的“井冈山兵团”成为全校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之后，蒯大富明白，应该在全校的范围选择更有代表性的人选作为“井冈山红卫兵”的提名进入“井冈山兵团”的总部核心。

至于蒯大富为什么会提名我进入总部，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我的《少数赞》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对“第一湘江”的战斗力的也比较认可。二是“天安门纵队”在促联合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也是识大体的，并没有出现他曾经担心过的另立山头的局面。对此我想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三是“天安门纵队”一成立就显示了相当强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并且开创了下属十多个战斗组的纵队形式。原本是为促联合而成立的纵队，尽管并没有明确谁是“天安门纵队”的负责人，但是在“天安门纵队”这些战斗组组长中，显然我是比较活跃著名的一个。我在无意中由一个战斗组组长而升级为一个纵队的代言人。手下人多势众了，分量也就随着加重了。蒯大富不会看不到这点。他在总部会议上给我分派的工作就是联系“天安门纵队”。

就这样，在无意识中我被文革运动的漩涡裹卷到清华文革舞台的中心。



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对蒯大富的印象都是非常好的，对他也是打心眼里佩服的。我明白这是蒯大富对我的重用，我也积极靠近他。

“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着清华大学当时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这个联合，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多月，中间的反复波折颇多，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井冈山兵团”刚成立五天，唐伟等三名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总部委员，因“对总部的一些行动很不理解”、“宁可右倾，不当阿斗”而宣布辞职。刚刚联合起来的造反派立时现出了裂痕。

唐伟在清华文革的舞台上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从“八八串联会”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来，我对唐伟一直非常钦佩，他在我心里一直有很重的分量。我对唐伟的辞职，既不理解，也不满意。到底有什么重大的原则分歧非要在刚联合后马上就分道扬镳呢？我认为唐伟辞职是一种不顾大局的分裂行为。因这件事，我对他开始有看法了。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唐伟并不是因为反对12.25行动而辞职的。那时他并不知道蒯大富要搞这么大的行动。他们这几个人是因为看不惯蒯大富在联合过程中搞的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譬如“蒯大富公布的上述总部成员名单与三总部商定的人员严重不符，蒯大富独自做主修改人员”，看不惯江青和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无原则支持，他们经过慎重考虑以后才作出痛苦的选择。唐伟在这个时候已经对蒯大富的人品、做派很有看法了。

当时我不了解唐伟辞职的真正实情，所以只对唐伟不满，没怪蒯大富，因为我与老蒯正热乎着呢。现在看来，那时唐伟对蒯大富的看法基本是正确的，对他的辞职也理解了点。不过，我还是想，唐伟当时要是不辞职，在兵团总部内做一个起建设作用的反对派，在蒯大富犯错误的时候，起到批评、抵制、反对的作用，可能对清华的文革运动更有利一些。那样，我可能很快也会成为以唐伟为首的反对派中的一员。只是，不仅唐伟与蒯大富的政治观点和理念很不一致，而且唐伟的个性是属于宁愿痛痛快快地干一仗、不愿委曲求全地坐一起的那种人。所以，唐伟与蒯大富的分手是迟早的事，可能难以避免。

唐伟辞职后马上就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纵队”。

这之前的一天，由原“井冈山红卫兵”旗下的“第一星火”、“打落水狗”等一批坚定支持蒯大富、观点比较激进的战斗组成立了“28团”。

随后几天，宿长忠（水7）沈如槐（力0）成立了“八八纵队”，陈楚三（力6）成立了“东方红纵队”，刘万章（工物6）成立了“毛主席警卫团”。他们与唐伟的“毛泽东思想纵队”一起合称为“三纵队”。“三纵队”的骨干战斗组如“向日葵”、“千钧棒”、“战地黄花”、“红色小老虎”等等原来都是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

也就是说，虽然“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旗号消失了，联合成“井冈山兵团”，但是在表面统一的兵团之下，又冒出了好几个“纵队”、“团”之类的组织。“井冈山红卫兵”的核心力量换了马甲叫“28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核心力量换了马甲成了“三纵队”。

有两个不争的事实是：

一、只有“天安门纵队”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前为促进三总部联合而成立的，其他

所有的“纵队”和“团”都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才成立的。

二、只有“天安门纵队”是跨原来的三总部的，不具有明显的“井冈山”色彩或“八八”色彩。而其他的“纵队”和“团”都是由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井冈山红卫兵”的核心战斗组组建的。

所以，对新生的“井冈山兵团”而言，“天安门纵队”明显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没有原来红卫兵组织的“派性”，而其他的“纵队”和“团”都多少表现出原属红卫兵组织的“派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离心的涣散的作用。

原有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后消亡了，这些红卫兵组织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在表面联合的遮掩下，骨子里还是没有真正联合。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远远没有消除，对立的两派已经显现。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局面，无论是对新生的“井冈山兵团”，还是对“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蒯大富，都是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他们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读史笔记】

以史为鉴

• 周家琮 •

人们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历史教训。——罗素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本乃“仲尼厄而作春秋”的夫子自叹。二千年后记者会上再闻总理此言，听到的却是功罪自有历史评说的无奈和坦然。面对黯淡的现实，人们往往寄期望于历史。起义失败的青年卡斯特罗，在法庭上陈辞慷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面对枪口的匈牙利改革领袖纳吉大义凛然：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文革被活活打死。卞的先生王晶尧，抗议校方至今仍对暴行责任者宋某荣誉有加，出语悲愤：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文革中被批斗的国家主席也自我宽慰：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不知他有没有料到，后来党的中央全会决议里，却编造了诬其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在这类决议里，史实如同去年国博北门的孔丘塑像，可以随意搬来搬去，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言虽出自胡适，却并非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适之先生本意，恰恰印证了历史常被涂抹的悲哀。）难怪美国记者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断言：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因此历史是否值得信赖，取决于书写历史的人们、记述历史的时代，是否值得信赖。持笔丹青者，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还是小说《一九八四》里所刻划的，温斯顿等专司在真理部篡改编造历史的角色。而借助历史的记录，反过来对记述历史的学者和团体、国家与时代，也可以有更深入的观察和评价。人们从“以史为鉴”、“察古知今”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比如回顾明清以降中朝关系，谨防重蹈昔日陷阱；检讨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助推德国纳粹上台；剖析历代变法得失，以资今日改革方略之借鉴；从史事和现实的对照中总结经验教训，窥见兴废得失。还在于能从对历史的态度，照见当下时代的面貌和精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论史识笔走春秋，无不折射出当代述史者的观念、立场和道德水准。罔顾史实歪曲造假者，当下必无诚信可言；褒贬古人溢美盈恶，今日之事亦难言公正；对历史疮疤和谜团粉饰掩盖，现实政务的透明公开更不可期待；不尊重历史，就不可能尊重今天和未来。

对待历史最狂妄无耻的当数秦始皇，焚毁载史之书，坑杀记史之人。此前历史一笔抹杀，从他开始才算数，自称始皇帝。与禁写编年史、违者问斩的沙皇伊凡堪为伯仲。与其对历史的态度相匹配，秦政的暴戾苛虐亦为二千年之最。邻邦皆视为虎狼之国，以吏为师、“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的卖官鬻爵，中国不少坏制度坏传统，也是秦代的发明。二千年秦以恶名载史，直到古人今人一概打倒，既扫四旧又斗黑帮的文革年代，才有了“百年皆行秦政法”、“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知音同道。而历代凡重视历史，将修史视为国之大事的，也大抵在所谓太平盛世。对待历史的态度，或可作为有无盛世之象的判据。判断国家亦如此，那个六十年前始则率而冒险、后又求救于中国的邻邦，对中国当年的重大牺牲和救命之恩，在今天的官修史书中居然几近空白。与对历史的无赖相吻合的，正是其现实的黑暗和荒诞。上世纪中叶的中国，鼓吹对历史“鄙视过去，迷信未来”、“踏倒三坟五典”，对应的现实，正是政治残酷内斗、经济狂热蛮干、文化专制荒芜。昨天的历史、当下的新闻，统统被政治绑架。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成了“高大全”；苏区肃反、延安抢救的血腥被轻轻抹去；毛选注释谎称西路军溃败罪在张国焘分裂；至于韩战系美帝挑起，饥荒乃天灾所致，万斤亩产的卫星、子虚乌有的冤案，乃至伪造新闻照片，陈毅之头被换邓小平、王海容掉包冀朝铸，处处充斥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谎言。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尘封的史实得以重见天日，若干被歪曲的历史得到较客观叙述，对历史人物有了多维视角和公正评价。历史学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的新气象，虽贡献主要来自民间，亦足以彰显社会意识和政治文明的长足进步。但为了政治需要，掩饰歪曲历史的文革遗毒并未肃清。过去对历史的造假，也没有得到正式全面的反省和纠正，仍在误导和欺骗今人。清华一例：投笔从戎献身冀中抗日、却被冤杀的清华学长熊大缜，校园里新立的英烈碑述其生平，镌刻的仍是匪夷所思的“因公殉职”。对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历史创伤，官方话语更是讳莫如深。对最值得总结教训的文革当代史，不但未能恪守真诚面对、忠于史实、客观公正的基本史德和精神文明，还刻意抹去文革的集体记忆，以致对文革历史的歪曲和谎言，随处可见。与之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世界各国对待类似文革灾难历史的真诚：在西欧，当代德国人以尊重历史赢得世界尊敬。离柏林墙遗址不远，街头公园陈列着纳粹批斗政治犯、冲锋队狂热集会的图片。倘忽视人群面孔，酷似中国文革场面。在慕尼黑市郊，囚禁过犹太人和不同政见者的达豪集中营，笔者目睹一批又一批的中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悼念受害者，反思民族历史上丑陋的一页。在柏林市中心，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带，本世纪初又建造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规模十分可观，镌刻着众多犹太受难者的姓名。英国官方于1998年，对26年前镇压北爱尔兰游行的真相，进行了调查、公布和道歉。连罗马教廷也宣布，纠正自己600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在东欧，俄罗斯在斯大林肃反的屠杀地、莫斯科布托沃射击场设立了大清洗纪念地。在喀琅施塔得，为被镇压的兵变死难者竖立了纪念碑。10月30日被定为俄罗斯政治迫害遇难者纪念日，纪念集会上——公布大清洗死难者的姓名，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被再次唤起。出席集会的总统普京告诫：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乌克兰把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纪念斯大林时代饿死的同胞。在北美，美国人对历史上的扒粪时代、三十年代大萧条、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种族歧视等历史疮疤，记述唯恐不够详尽。对歧视华工和日侨的历史，也公开承认并官方道歉。在非洲，南非有纪念索维托惨案的博物馆。在亚洲，蒙古有“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韩国有“真相与调查委员会”，调查并公开韩战期间政府对左翼人士的迫害。在中国的台北，也有马场町纪念公园，纪念包括中共人士在内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称他们为“追求社会正义的热血志士”。白色恐怖的罪魁祸首虽非国民党莫属，时任台北市长的国民党人马英九，却并未忌讳为公园命名并对死难者悼念。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警示国人引为殷鉴”的勒石镌文，发人深省。环顾全球，大陆对待文革历史态度之特色，实在令国人蒙羞！

文明各国，对包括灾难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建设纪念场馆，开展纪念活动。惟独中国文革，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已过去三十年，除汕头和大邑二处难副其实的民间展

览外，官方的态度仍然是冷漠和禁绝。温总理出访之际，去奥斯维辛悼念异国的政治死难者，诚为文明国度官员应有之风范。然国人岂不因此而困惑：偌大中华，何时又能辟一隅之地，也可供国人悼念文革受难同胞？民间的“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开了二年竟被封杀。倒是很有美化文革之嫌的“五七干校纪念馆”、“知识青年博物馆”，在若干地区堂皇开张。粉饰苦难岁月和荒谬政策的电视剧《知青》，同样可以高调上演。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无论是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燕园、还是红卫兵发源地清华附中、毁于薄熙来们红色恐怖的清华二校门、以及本乃斯文之地，老舍等文人却在此遭毒打的国子监、打死校长的师大附中、批斗国家主席的中南海，今天一概看不到当年文革的任何历史踪影。中宣部明令规定，对文革出版物要“严格审查”。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研究仍属禁区。《东方》杂志纪念文革三十年的96年5月刊，被勒令销毁。2006年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众多媒体准备的纪念文字被禁止。荧屏之上、官方出版物中，八十年代后文革题材的作品已十分稀见。眼下名目众多的周年纪念频繁上演，唯独对于文革没有任何纪念。本世纪以来，建党纪念活动领导人讲话，也不再提起文革。在纳税人供养的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文革研究事实上成为禁区。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里，文革的巨大灾难被轻轻简略带过。美化文革的鼓噪，反倒颇能迷惑对文革无知的一代年轻人。去岁刚开馆的国博，举办《复兴之路》的党史展览。与建党初期翔实史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浩劫竟被简化为三张庆典照片。颇有上了年纪的观众驻足照片之下，摇头长叹。总之不纪念、不研究、不教育、不讨论、官方失语、集体遗忘，显然已被确定为对待文革历史的既定方针。对晚近的一段国家历史，如此刻意回避，不但鲜见于今日文明诸国，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之说，在积贫积弱的岁月或无可奈何。但“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境外”的现象竟发生在今天，只能是大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耻辱。“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文革历史如此被漠视和遗弃，不但暴露了当下的虚伪失信和逃避责任，更预示着今后重蹈覆辙的巨大历史风险。

近年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官修党史问世，自然无法再回避文革。但其中第二卷的文革叙述，同样使人深觉困惑和遗憾。撰写建国后不满三十年的党史，历经十六寒暑、四任研究室主任，恰与司马氏孤笔撰《史记》的光阴比肩。落笔时的纠结、杀青之际的难产，亦可以想见。其中对文革的持论，自不会偏离有关历史问题的正式决议。文革依然被庸俗化为领袖犯错误、又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故事。淡化了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文革意识形态根源；忽略了独断专行、破坏法制的文革制度土壤；回避了引发文革的深刻社会矛盾；模糊了文革前极左路线和历次政治运动，必然导致文革的历史进程。对文革的记述，还绝非无心地忽略、淡化了若干重要的经纬脉络：

一，忽略了相当一部分文革被迫害对象，在文革不同阶段也认可、参与甚至主导了迫害他人。整肃彭罗陆杨，绝非仅毛林所为；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和各级当权者，主导了文革抓黑帮、斗群众、斗干部的第一波浪潮；将“黑五类”扫地出门、遣送出京是官方的有组织行为，后来被打倒的老师亦曾为“破四旧”喝彩；口口声声文革受迫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不但隐匿当年恶行，还无耻地自我标榜最早觉醒，其实是文革前期红色暴行的主力军；文革初期被整的干部，文革后期一旦再度掌权，仍以文革的理念、文革的手段斗人整人。甚至到了文革之后，若干文革曾被迫害的老干部，又以文革手法，整肃曾经努力解放他们的胡耀邦。

二，突出文革中各级官员、文化精英所遭迫害，淡化无数普通百姓所受苦难，更刻意回避对传统“阶级敌人”、以及其它干部群众的大规模迫害。对文革初期响应号召参与运动的群众，在后期清队、抓516、一打三反中，被大规模报复迫害的史实，语焉不详；尤其是许多对文革、对林彪四人帮、对发动文革领导人怀疑反对者，惨遭迫害，对其全面真相和指使者，亦三缄其口。对“黑五类”遭灭门屠杀、中外历史罕见的道县、横县、大兴等地的惨案，更只字不提。

三，最先冲破文革暗夜的，是一批民间的文革批判者。他们开启了思想解放之先河，其思想和勇气均堪为民族之前驱和骄傲，足以让追随文革的衮衮诸公蒙羞。但文革历史的这一面，他们的代表人物“乾坤特重我头轻”的遇罗克、林昭、杨小凯、“李一哲”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被一笔抹杀。

四，由文革前的阶级路线发展到文革中的血统论，折射出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对立。文革中群众派别的形成（如清华附中文革初期的学生派别）、重大事件和惨案的发生，许多与之关系密切。由血统论折射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但在分析文革时不容忽视，而且在文革后直至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格局。该书对文革中血统论的喧嚣一时，以及代表人物和严重危害，却只字不提。

五，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是铸成执政党大错的重要原因，也是推动文革狂热的重要工具。对此民族精神沦丧的一页，作为党史亦毫无记载和批判。难怪个人崇拜的封建余毒，今天又在沉渣泛起。鼓吹个人崇拜的红歌，前一阵又唱响大江南北。

六，无论是文革前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还是文革中对稳定乱局起过重要作用的“三支两军”，军队在文革政治中的作用都举足轻重。文革时期实行的也是典型的先军政治、先军经济。但该书对先军体制，对军队介入政局、管制社会产生的问题和教训，对军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长远影响，却只是一笔带过，缺乏认真的检讨。

七，作为今日成书的当代史，对文革时期的经济，不应仍只是从计划经济的视角加以叙述。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深挖洞”方针的荒唐和代价，固不容忽略。文革时期低下的经济效率、掠夺百姓福利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畸形的经济结构，也都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视野下，予以记录和纵横向的比较。

八，内政外交，本为一体。建国初期迷恋于虚幻意识形态的内政，决定了始则结盟苏联继则反目成仇的外交。其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今日颇可检讨。文革的内乱必然影响外交，但该书对包括输出革命在内的外交和文革的关系及后果，亦语焉不详。尤其是中苏关系，从“说了许多没有用的话”的意识形态论战，到文革中冲突不断升级直至兵戎相见，不但浪费庞大国力投入备战，甚至一度使国家濒临核打击灾难的边缘。对此重大战略失误，更不可缺少深刻的检讨和反省。

该书辑录史事的缺失，使得对文革若干重大事件，至今仍难窥全貌真相莫辨。文革中党内高层复杂关系之变迁，伴随和左右了文革的进程和结局，该书对此不着一墨。对林彪的整肃缘何而起？侮辱全国人民智商的设“国家主席”说，至今并未正式否定，“九一三事件”仍属文革重大之谜。云南沙甸等地的武装镇压事件、溺亡二十余万人的河南板桥水库溃决，该书对此类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处置、责任和教训，皆若无其事，缺乏起码的交代。对文革中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输出革命酿成的巨大灾难，也只字不提。自孙文以俄为师、实行党国体制以来，党史国史难分，该书应该也代表对文革历史的国史表述。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将付梓，其对文革的叙述，与党史是否轩輊难分，不妨拭目以待。

虽然系统的文革史研究，或许可以留待更具历史感的后人。但今天任何涉及文革的历史记述，都不可不遵循陈寅恪先生“从史实中求史识”、谭其骧先生“求是先求真”的教诲。对重大事件的基本史实，不应有任何的省略、含糊和删节。八十年代初囿于当时政治环境形成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的论述有所简略或情有可原。但当年对所谓文革敏感问题，尚没有现今如此多的禁忌；对文革罪行的揭露，比眼下也更真实和大胆；对文革的反思，比今天还要真诚和深刻；那时更难以想象，有人胆敢像今天这样，居然公开为文革招魂摇旗呐喊。文革在当时和今

天的境遇反差，足以提醒我们：对文革的记忆和揭露、反思和批判，三十年来不但没有前进和深化，反而倒退甚远。而淡忘文革记忆、回避乃至歪曲文革历史真相的倒退之举，正被美化文革、鼓吹文革卷土重来者所利用。他们利用年轻人对文革历史的无知、对今日社会弊病的不满，继承文革道统挑战改革开放，妄图实现他们没有文革的文革式乌有之乡。

历史专业在当代中国虽渐遭冷落，地位远不及欧美。但饮水思源、慎终追远，仍不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对辛亥、长征、抗日、内战、改革开放乃至自然灾害，不断举行各种纪念。修族谱、建祠堂、公祭帝王先贤，亦蔚为时尚。但惟独当代历史中的政治灾难，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不但被划为研究和纪念的禁区，还刻意抹去相关的集体记忆。官方对此虽无正面的坦白和解释，但事实却有目共睹毋庸置疑。刻意淡忘文革的原因或许很多：还原文革历史真相，势必揭穿“为尊者讳”的欺骗，不利其追随者再拉大旗作虎皮；此前的文革政治结论，经不起历史研究的推敲检验，重新评价不但会引发争论，而且将影响既有的政治格局，胡乔木当年曾阻碍真理标准讨论，理由就是声称讨论会导致党分裂；文革中也曾神气过的阿Q们，如今有的春风得意甚至盘踞高位，忌讳再揭头上的疮疤；最要害的则是反思文革，必然引发对文革思想和制度根源的怀疑和批判；揭露文革黑暗有损执政党的形象和威信，动摇执政合法性。当年国民党元老阻挠蒋经国“解严”，吓唬蒋的就是所谓“动摇邦本”。但谎言终究不能持久，卡廷惨案事隔七十年，真相还是终于曝光。隐瞒也树立不了威信，一旦骗局被揭穿，谎言制造者的信誉和统治基础随即崩溃。大清洗真相被揭露后，法捷耶夫自杀象征一代政治精英的信仰毁灭，而东欧则爆发此起彼伏的反抗。林彪一旦出逃，既有虔诚信徒因此精神错乱，更有曾经无比狂热的文革一代年轻人，因发觉上当受骗而觉醒，终于以四·五运动为代表，发起了对文革和当局的公开挑战。现实的政治失信，与掩盖历史真相的自私短视，总是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不能真诚反思历史，遑论坦率面对现实；对他人历史之过尚且粉饰掩盖，对自身今日之误更难承认改正；当诚信成为社会稀缺资源，公信力缺乏每被质疑甚至反读，应当深刻反思治本之道的，首先应在庙堂之上。今天的新闻就是昨天的历史。非典初期对疫情的隐瞒，不应只认为是少数官员的品德瑕疵，而是当事人在隐瞒事故、蒙骗公众的潜规则中浸淫已久，相沿成习作出的习惯应对。当假球假唱假药假数字泛滥成灾，当上市公司包装、官员学历注水成为普遍现象，当孩子们也学会了在虚矫中写作和发言，连歪曲二战历史的某邻国也反唇相讥：自己的历史随意涂抹翻云覆雨，有何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连自身的历史都能作伪，还有何不可造假？公信力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资源，一旦丧失再图恢复谈何容易。徙木立信固属历史笑谈，指望政令说教和口号可以重建诚信，亦无异于缘木求鱼。某人大代表提议建百姓道德档案，或系肉食者的弱智。兰州某校要给学生发“诚信证”，山西某地纪念关公以彰诚信，更显荒唐。特权车违章横行随处可见的国度，难言良好的交通秩序，遑论健康的社会管理。沈阳商铺闻官府检查统统关门，官商学界精英用脚投票纷纷移民，已充分证明政治不透明、公信力丧失，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并由此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君子之德风，重建社会诚信只有从执政者的表率做起。最容易起步而又可取信于民的，不妨自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始，自彻底公开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真相始。德国统一后，对是否公开前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档案，也有过担心和争论，但最终公开的结果，恰恰是恢复了社会信任民族和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革新，平反冤假错案是重要标志之一。其伟大历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宣布本来无罪者的清白，而是执政党历史上首次勇敢面对历史真相，承认和改正自身错误。此举高度凝聚了人心，重塑了执政党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为此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信任基础。

在一个缺乏普遍宗教信仰的国度，饮水思源慎终追远，对祖先和历史的敬畏，既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又是承载社会政治价值的经世资源。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千年，历经祸乱却不曾湮灭，离不开对自身历史的敬畏和传承。国博陈列的西周大盂鼎，先人们在十分原始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郑重地将291字的铭文铸于鼎上，记述史事于国之重器，足见其对历史的敬畏和虔诚。而在国博邻近大厅同时展出的《复兴之路》，以三张照片敷衍文革十年，传递出的是

主办者侮史欺世的愚蠢和轻慢。刘少奇 1962 年夏忧心忡忡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透露出对历史的敬畏所唤醒的良知。而不惧史笔之诛的文革发动者，埋怨西湖一带古墓让其“处处与鬼为邻”，破坏了勾留山水风月的心情。胡大秘书随即唱和：“土偶欺山，妖骸祸水”。一句顶一万句的结果，是西湖边的秋瑾墓和抗战纪念碑，在 64 年底被大无畏地掘毁。其蔑视传统割断历史的狂妄暴露无遗。文革红卫兵砸瞿秋白碑、毁孔庙、掘抗战英烈墓，始作俑者实为此主仆二人。对自身的历史和先人疯狂糟蹋破坏，在文革中达到顶峰，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乃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然而蔑视历史的文革遗毒，今天并未得到认真清算。对历史无所畏惧的另一端表现，是路易十四式的蔑视未来哪怕洪水滔天。以发展是硬道理的名义，追求短期政绩和私利，透支资源、环境和市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已成地方施政方针的主流。对真古迹的漠视破坏、对假遗址的争夺炒作、对历史无知加庸俗的戏说，皆为历史伦理堕落的明证。最近更有人声称：上世纪 60 年代初饥荒死人系子虚乌有，且出此妄言的林某并非一介无知青年，而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历史系、人民日报西北某省的负责人。此例令人扼腕之处，并非个别人的无知，而是由此可见历史教育和喉舌部门的堕落。可以一并立此存照的还有：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近年出版，其中将若干领导人自然病逝皆列为国之大事，而对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则视为末节未置一词。最近又有人在报纸撰文，颠倒黑白地声称：“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以此类推若干年后，倘又有某喉舌放言文革苦难均系子虚乌有，可能再也不至引发惊讶。对钓鱼岛等领土争端，文革发动者本负有历史责任，但在最近反日游行中，却大量出现对其怀念的口号照片。说明对历史真相的刻意隐瞒和抹杀，造成一代人对当代历史的无知，其严重后果已开始显现，并将影响深远。而对历史的无知，加上现实困境和外部争端，正是孳生集权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文革前“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格言，《千万不要忘记》的电影，都把回忆过去作为思想灌输的工具。文革首批罹难者邓拓，也写过《专治健忘症》一文，揭露貌似健忘、实则无视历史教训者的丑态。为了昭示后人不忘历史苦难，钱理群先生呼吁《拒绝遗忘》，俄罗斯的莉季娅著书《捍卫记忆》。但要让饕餮民脂者记住大饥荒，让钟情红歌者不忘文革苦难，不啻是指望可以唤醒装睡者，让死人埋葬自己的尸体。历史无关记忆，历史不会被遗忘只会被遗弃，面对历史需要的不是记忆力，而是诚实、良知和勇气。揭示文革历史真相、记取文革历史教训，首要的并非史料的钩沉和学术的辨正，而是观念的改变和思想的反省，其前提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政治的革新。而政治革新的成效，正可以从如何对待文革历史得到验证。当天安门广场上终于有了一座文革博物馆；当国家终于沉痛集会悼念文革死难者；当文革信史可以出版、文革纪念碑得以矗立；只有那时，我们才没有辜负先烈林昭的嘱托：“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而中国的历史，才可以说终于又翻开新的光明的一页。

□ 原载《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2 月第一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